

二十一世紀評論

九十年代以來的俄羅斯改革

解體與恢復

——從戈爾巴喬夫到普京

● 拉特蘭
(Peter Rutland)

一 理解蘇聯的解體

1989-1991年的一系列事件導致了蘇聯的解體。鑑於事態發展得太快，以及在內憂外困的雙重壓力下，政治行動者根本就來不及制定一個統一的行動綱領。故此，討論甚麼應該先改革、甚麼應該後改革的問題實在沒有太多意義。我們經常可以聽到一種論調，說戈爾巴喬夫應該先進行政治改革，再着手經濟改革。事實上，他試圖同時進行兩種改革。

1989-1991年的一系列事件導致了蘇聯的解體。這些事件通常被視為一場社會革命，隨後便是民主過渡。但實際上，這是一種系統解體，而不是一種過渡。無論是「革命」模式，還是「過渡」模式，都暗含着某種有序的歷史發展，或至少暗含着一個由社會行動者——或者是精英，或者是大眾——針對某一明確、融貫的目標而發動的進程。

事實上，蘇聯的政治和經濟體系不過是在內憂外困的雙重壓力下解體了。政治局勢飛馳電掣般地變化，令政治行動者困惑莫名，無所適從。鑑於事態發展得太快，他們根本就來不及制定一個統一的行動綱領。只有少數政治行動者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其中主要包括幾個波羅的海共和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領導人和人民，他們以和平、不流血的方式使自己的國家脫離蘇聯而贏得了獨立。幾個高加索共和國（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和阿塞拜疆）雖也贏得了獨立，但卻飽受血腥戰亂之苦，少數民族地區的分裂活動此起彼伏。

有鑑於此，討論甚麼應該先改革、甚麼應該後改革的問題實在沒有太多意義。例如，我們經常可以聽到一種論調，說戈爾巴喬夫 (Mikhail Gorbachev) 犯了一個錯誤，他應該先進行政治改革（公開性或新聞自由，隨後是民主化），然後再着手經濟改革。事實上，戈爾巴喬夫試圖同時進行兩種改革。但是，他在1985-1987年間推行的一系列經濟改革沒有取得甚麼成效。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這些改革在構思和設想上不夠徹底，另一方面，它們也受到了官僚機構的梗阻。蘇聯的統治精英（思想理論家、經濟管理者和軍方）中沒有一個核心

群體支持改革。戈爾巴喬夫最後斷定，有必要引入更多的政治改革來推動經濟改革。一旦在政治制度上打開了缺口，維繫着政治制度的那種恐懼心理便不復存在了。但是，戈爾巴喬夫隨後卻發現，政治討論並沒有集中在他自己擬定的改革議程上，而是集中在一些令他不快的問題上，包括波羅的海和高加索共和國不斷高漲的爭取民族獨立的呼聲。

從經濟上看，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是一種複雜的、高度整合的機制，很難想像人們怎麼能夠將市場要素逐步地、零星地引入到這種體制中去。從50年代以來，幾代蘇聯領導人試圖增加這一體制的靈活性，但未能取得成功。人們只能得出結論說，這一體制壓根兒就改不了。須知，它是一種已經存在了七十年的體制。年增長率持續下降，到了80年代，經濟增長終於停滯不前了。這意味着，蘇聯經濟無法產生出新的資源以滿足消費者愈來愈高的期望，或抗衡美國自1980年開始的新的軍事集結。不過，蘇聯的國內生產總值並沒有下降，一直要到1989年體制開始瓦解時才真正走下坡路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不是對經濟崩潰作出的回應，而是導致了經濟崩潰^①。

從政治上看，蘇聯實行的是高度集權的體制。在這個體制內部，不存在任何民主或多元的成分；後來的事實也證明，蘇聯共產黨根本無法適應競選。這種集權體制的最重要的例外是，蘇聯國家具有一種聯邦的、多民族的性質。俄羅斯族只佔全體人口的54%，國家本身是按聯邦方式組織起來的，十五個加盟共和國享有一定程度的行政自主性。這種聯邦體制為蘇聯解體提供了一個現成的框架，另外兩個社會主義聯盟——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同樣如此。前後不過兩年的時間，這幾個社會主義聯邦就紛紛解體了。

在波羅的海和高加索的幾個小共和國，大多數人都希望脫離蘇聯。戈爾巴喬夫在着手推動民主化進程時，馬上就面臨着這一挑戰。如果他動用武力鎮壓民族主義者，就會失去西方的支持，廣泛蔓延的恐怖氣氛很可能使他的國內改革計劃夭折。另一方面，如果他答應民族主義者的獨立訴求，他就會遭到黨國保守份子的反對，1991年8月的未遂政變即說明了這一點。政變以後，各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決心解散蘇聯，而這批人也繼續留下來擔任這些現已獨立的國家的總統。

國際環境變化是解釋蘇聯解體的最後一個因素。當初創建蘇聯時是想讓她成為世界革命的搖籃，其最終目標是要消滅全球資本主義，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這是蘇聯政治認同的核心元素。在30年代，這意味着要建立一支常規軍以抵禦帝國主義侵略；1945年以後，這意味着在兩個層面上與美國進行冷戰：一方面與美國展開核軍備競賽，另一方面與其爭奪第三世界的霸權。蘇聯的經濟機制本來就效率不高，現在再加上超級大國的地位，結果讓蘇聯背上了沉重的負擔。戈爾巴喬夫在1985年當選蘇共總書記後認識到，蘇聯必須放慢發展核武器的步伐，與美國進行談判，結束她於1979年發動的已釀成巨大災難的阿富汗戰爭。與此同時，戈爾巴喬夫決心不再以武力維持蘇聯在東歐的霸權地位。這些妥協令西方領導人感到吃驚，他們給了戈爾巴喬夫600億美元貸款作為回報。事態發展也讓蘇聯的保守派驚恐萬狀，給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少數族民族主義者壯了膽。

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是一種複雜的、高度整合的機制，其經濟增長到了80年代就停滯不前了。蘇聯的政治體制是高度集權的，不存在任何民主或多元的成分。但蘇聯國家具有一種聯邦的、多民族的性質。在波羅的海和高加索的幾個小共和國，大多數人都希望脫離蘇聯。戈爾巴喬夫在着手推動民主化進程時，馬上就面臨着這一挑戰。

二 葉利欽年代

隨着蘇聯的解體，開始了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從經濟上看，國家陷入了急速的滑坡。1991年出現了商品短缺，緊接着，1992年又爆發了2500%的超高通貨膨脹。1996年，通貨膨脹率降到25%，1997年進一步降到12%，但國內生產總值在七年間呈直線下降，從1990-1997年，累計下降了40%。從政治上看，葉利欽(Boris Yeltsin)總統(1991年6月選出)與人民代表大會(1990年3月選出)之間的權力分配極其混亂。不僅如此，聯邦政府與俄羅斯八十九個地區的關係也很不明確，尤其是二十一個擁有少數族共和國地位的地區要求獲得更多的權力。其中一個共和國——車臣——於1991年秋宣告獨立，否認自己是俄羅斯聯邦的一部分。

批評者認為，葉利欽利用聯邦制和民主化將戈爾巴喬夫趕下台，即使在此過程中把蘇聯毀掉也在所不惜。葉利欽認為，為了穩定經濟，只能強制採取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措施，以及加強總統權威。這實際上是以民主為代價換取市場改革。葉利欽領導下的俄羅斯是無政府狀態與威權主義的危險混合體。到1996年，俄羅斯已經出現了某種穩定的政治和經濟體制，葉利欽也在當年成功連任總統。

蘇聯體制經歷了政治和經濟的解體，這一事實意味着，遊戲規則在一年一年地變化。這種不穩定的環境讓俄羅斯的一些社會和政治行動者撈到了好處，他們利用這種不穩定獲取了短期利益，顛覆和破壞了各種制度。批評者認為，葉利欽本人就扮演了這樣一種角色，他利用聯邦制和民主化將其主要政敵戈爾巴喬夫趕下台，即使在這個過程中把蘇聯毀掉也在所不惜^②。相反，那些追求更長遠的目標、力圖建立可靠的公共制度的社會行動者在政治鬥爭中一般都是輸家。民主化造成的混亂局面使內部精英份子劫持了改革進程，他們一門心思圖謀私利，大肆侵吞國有資產^③。與此同時，葉利欽認為，為了穩定經濟，只能強制採取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措施，而這一需要為加強總統權威提供了正當理由。那些親資本主義的改革人士贊同這一觀點，實際上是以民主為代價換取市場改革。他們優先考慮的是如何避免回到過去的老路，而不是着眼於未來，建立新的制度。

葉利欽領導下的俄羅斯是無政府狀態與威權主義的危險混合體。葉利欽的當務之急十分簡單：牢牢掌握手中的權力，在這個混亂的環境中咬緊牙關熬下去，希望有一天能讓俄羅斯走上一條通向更美好的未來的康莊大道。葉利欽玩的是軟硬兼施的統治手腕，一會兒威脅，一會兒妥協。對於蘇聯時期遺留下來的舊制度，他採納了一些，廢除了一些，與此同時又建立了一些新制度。有些支配着人們生活長達數十年的強大制度一夜之間就灰飛煙滅了，其中不僅有像蘇聯共產黨和國家計劃委員會這樣的國家結構，而且還有一系列規範着社會行為的基層制度，例如少先隊或排隊買東西的習慣。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充滿活力、卻又很不穩定的新制度：經選舉產生的議會和總統、迅速成長的資本家階層、市場、自由新聞業，甚至(也許)還有公民自由。

到1996年，俄羅斯已經出現了某種穩定的政治和經濟體制，葉利欽在當年6月成功連任總統，就說明了這一點。在西方，這一過程一般被描述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從一黨威權國家向自由民主國家、從受意識形態支配的超級大國向西方盟友的過渡。實際上，在葉利欽領導下的俄羅斯，發生了許多互相矛盾的事件，無論從政治還是從經濟上看，該制度均未能達到持久的穩定。

那麼，葉利欽制度的本質特徵是甚麼呢？

(1) 超級總統制

權力集中在總統手中，尤其在1993年10月以後，情況更是如此。當時，葉利欽解散了人民代表大會，同時被解散的還有俄羅斯各地區經選舉產生的立法機構，以及最高法院(此前最高法院宣布葉利欽的行動違憲)。

戈爾巴喬夫於1990年設立了蘇聯總統這一職位，目的是要將自己的政治根基從不再支持其改革的共產黨轉移到1989年選出的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總統領導總統府，這是一個擁有七千工作人員的龐大官僚機構，它接管了中央政治局在克里姆林宮的行政辦公室，以及附近一些原為蘇共中央各部門辦公地點的建築物④。1991年6月，葉利欽當選俄羅斯聯邦總統，12月蘇聯解體後，他又接管了蘇聯總統的辦事機構。總統府還接管了前蘇聯國家和共產黨的巨大產業，估計價值達數十億美元。這樣，作為民主派的葉利欽實際上就保留了蘇聯舊體制的超級官僚機構，將它與一個經直選產生、有一定聲望的總統的民主合法性結合起來。

葉利欽的直覺告訴他，自由民主制和市場改革是新政權的兩大支柱。他幾乎沒有其他的政治系統可供利用。剛開始時，葉利欽和人民代表大會聯合起來反對戈爾巴喬夫，抵制戈爾巴喬夫維護蘇聯統一的努力。1991年11月，人民代表大會授予葉利欽發布總統令的緊急處置權。這些權力的有效期為一年，但即使在此之後，許多決定仍以總統令的形式作出，因為人民代表大會拒絕通過葉利欽提出的許多立法議案⑤。葉利欽與人民代表大會在俄羅斯應該制定一部甚麼樣的憲法(總統制還是議會制)、經濟改革步伐應該多快等問題上意見不一。

與總統府平行，還有一個由大約七十名部長組成的政府。1992年，政府由自由派經濟學家蓋達爾(Yegor Gaidar)領導，其後由原燃氣工業部長切爾諾梅爾金(Viktor Chernomyrdin)領導，直到1998年3月切爾諾梅爾金被解職為止。政府一直處於嚴重的分裂狀態，一邊是改革派，另一邊是保守派。政府內部的不同派別互相傾軋，眼看着私有制這個讓人垂涎欲滴的大餡餅，都想為自己切上一塊。政府實際上從來沒有履行過集體決策機構的職能。如同先前的蘇聯政府一樣，它只是一個從克里姆林宮接受指令的官僚行政機構。

(2) 裝點門面的民主制

從理論上說，俄羅斯滿足了選舉民主制的形式要求。總統、議會和地區領導人均由民選產生，並實行差額選舉，選舉結果並不總能提前預知。在葉利欽時代，選舉都是定期舉行，儘管某些地區可能有選舉作弊的現象，但一般說來，選舉結果反映了選民的意願⑥。麥克福爾(Michael McFaul)指出，到了1996年，俄羅斯的民主制已達到了可以合理期待的那種水平⑦。

我們如果再深入一步，就會發現，俄羅斯的民主制不過是一個形同虛設的門面。1996年和2000年的總統選舉只是為現任總統提供了合法性，而不是從一批參加競選的候選人中自由選出一位領導人。定期舉行的議會(1993年改名為國

戈爾巴喬夫於1990年設立了蘇聯總統一職，目的是要將自己的政治根基從不再支持其改革的共產黨轉移到1989年選出的人民代表大會。93年10月以後，葉利欽解散人民代表大會及俄羅斯各地區經選舉產生的立法機構和最高法院，權力集中在總統手中。葉利欽保留了蘇聯舊體制的超級官僚機構，將它與總統的民主合法性結合起來。他明白，自由民主制和市場改革是新政權的兩大支柱。

家杜馬) 選舉場面熱鬧，競爭激烈，但這些選舉其實並不那麼重要，因為政府並不是由議會任命，議會向總統和政府問責的能力也極其有限。在葉利欽時代，無論是政黨還是議會，都不允許成為強有力的政治組織。

這種裝點門面的民主有何意義呢？俄羅斯領導人認識到，若想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就必須用民主合法性來裝點門面。不僅如此，裝點門面的民主制也是確保國內政治安定的一個實際辦法。儘管俄羅斯的各類選舉具有形式上的競爭性，但它們實際上剝奪了選民的選擇自由，選民只有一種參與的幻覺，根本不能作出真正的選擇。這樣的選舉也讓統治精英能夠識別出誰是反對派領袖，進而用壓制和收買的辦法讓他們變得無害^⑩。

從理論上說，俄羅斯滿足了選舉民主制的形式要求，但再深入一步就會發現，俄羅斯的民主制不過是形同虛設的門面，這種門面既可以令俄國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也是確保國內政治安定的實際辦法。實際上，克里姆林宮善於玩弄各種新的「政治技倆」。總統選舉只是為現任總統提供合法性，無論是政黨還是議會，都不允許成為強有力的政治組織。

克里姆林宮善於玩弄各種新的「政治技倆」以操縱民主過程。大眾媒體(尤其是電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它幫助一些政治領導人樹立良好形象，而對另一些政治領導人則不聞不問，甚至通過揭露醜聞(無論是真實還是虛構的)讓一些政治領導人聲名狼藉。在私有化過程中，媒體落入一批私有者手中，他們利用媒體撈取政治資本。這一點在1996年葉利欽的連任選舉中尤其明顯，當時控制着兩家主要電視台(ORT和NTV)的商人成為葉利欽的競選支持者。克里姆林宮有效地利用了「行政資源」，地方行政長官也同樣如此。忠心耿耿的地方政客獲得了經濟和政治上的好處，而反對派領導人則成為稅收和刑偵調查的對象。

政黨制度——或政黨制度的缺失——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動盪。各黨派往往只是在兩次選舉之間匆忙組建和改組，個別議員走馬燈式地不斷變換陣營，讓選民搞不清楚誰代表甚麼。儘管俄羅斯定期舉行選舉，言論和結社自由獲得了形式上的保障，但卻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政黨制度。

唯一不變的就是俄羅斯聯邦共產黨(蘇聯共產黨的後繼者)^⑪。在整個90年代，共產黨贏得了大約四分之一選民的支持，這些選民多數是上了年紀的人，他們都是共產黨的鐵杆支持者。由於共產黨總是往回看，加之領導人又缺乏魅力，因此，它就無法贏得更廣泛的社會支持。在大多數別的歐洲後社會主義國家中，共產黨在民主選舉的第二波中經常都有不俗的表現。這些國家的共產黨進行自我改造，挑選新領導人，採納社會民主議程，贏得了那些在資本主義過渡中受到損害的人的選票。俄羅斯共產黨則從未採取這樣的過渡策略。

民主問責制僅在某些地方領導人身上得到了落實，使他們的實際權力受到一定的約束。從1995-1997年，足有一半的現任州長在爭取連任的選舉中失利^⑫。不過，從1999-2001年，又出現了一個循環，三分之二的現任州長都獲得了連任。不僅如此，這些地區鐵腕人物一旦上台，其權力就幾乎不受限制。無論是地區立法機構，還是經選舉產生的市政官員，都很難約束他們的權力。

(3) 分權

葉利欽時代的一個突出特徵就是，莫斯科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對八十九個地區的控制，從而導致了強有力的地區鐵腕人物的崛起，車臣脫離聯邦的舉動就是一個明證。俄羅斯有二十一個少數族自治共和國，這些共和國內部的鐵腕

人物都利用共和國的特殊地位宣布其為「主權」共和國，拒絕執行許多聯邦法律。位於伏爾加河中游的韃靼斯坦共和國——當地居民多為穆斯林——是這場運動的主力軍，它拒絕將年輕人派到共和國境外去服役，拒絕向莫斯科納稅，甚至不讓聯邦財政部在其境內設立辦事機構。其他許多共和國也紛紛效尤。這些共和國以及許多常規地區還通過了不少與聯邦法律相抵觸的法律。

葉利欽總統不但不遏止、反而還鼓勵這一權力下放的進程。他在1993年和1994年與地區鐵腕人物達成協議，允許他們開拓地區勢力範圍。當時，葉利欽正與議會進行鬥爭，他用這種辦法換取了地區鐵腕人物政治上的效忠。1994年2月，葉利欽與韃靼斯坦共和國簽訂了正式雙邊協議，在幾年的時間內，先後有四十六個地區與聯邦政府簽訂了這種特殊協議。車臣對俄羅斯的領土完整發起了最嚴峻的挑戰。1994年12月，葉利欽允許手下的將軍佔領車臣，打擊這個事實上已經取得獨立的共和國。然而，俄軍在戰鬥中陷入僵局，1996年8月，葉利欽被迫同意從車臣撤軍。

但是，這一過程削弱了俄羅斯人的全民一體感，似乎這個國家不再擁有一套統一的法律了。與此同時，它還給俄羅斯的財政預算造成了毀滅性後果。1996年，聯邦政府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2.3%，所徵收的稅卻只佔13.4%，而在1990年，聯邦政府的稅收佔到了國內生產總值的25%到30%^①。

從積極的方面看，由於中央權威的削弱，許多地區（例如莫斯科）有了更多的自由空間去實現更迅速的社會經濟轉型。不過，這也拉開了富裕地區與貧困地區的差距，迅速加劇了社會不平等（參見今期季米特洛夫的文章）。

(4) 武力，而非法治

由於缺乏一個獨立、可靠的司法體系和一個協調的政治組織，法治完全崩潰了。為了對付敲詐勒索者，強迫商業夥伴履行合同，大大小小的企業愈來愈多地求助於有組織的犯罪團夥（黑幫）^②，建立起自己的「保護傘」，即一個為其提供保護的犯罪團夥。作為回報，企業讓犯罪團夥分享一部分利潤。大型企業設立自己的保安部門，相當於有了一支包括情報人員在內的私家軍隊。

企業需要有組織的犯罪團夥提供這種保護服務。有需方，就有供方。犯罪團夥保持了它們在蘇聯時期（主要在監獄裏）形成的行為準則，這就提供了違法犯罪的「社會資本」，為新興市場經濟引入了一種制度性服務機制。社會上有大量剛從部隊退役的無業年輕人，犯罪團夥能夠輕而易舉地在遍布俄羅斯城市的體育俱樂部和武術團體中找到他們，並將他們羅致到自己的麾下。

(5) 安全部門一仍其舊

如前所述，並非所有的蘇聯舊制度都與蘇聯一道煙消雲散了。蘇聯政權的兩大支柱——安全部門和軍隊——實際上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成為1991年以後的政治秩序的重要元素。

莫斯科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對八十九個地區的控制，從而導致了地區鐵腕人物的崛起，葉利欽還鼓勵這一權力下放的進程，以此換取地區鐵腕人物效忠。但是，這一過程削弱了俄羅斯人的全民一體感，還給俄羅斯的財政預算造成了毀滅性後果。從積極的方面看，由於中央權威的削弱，許多地區（例如莫斯科）有了更多的自由空間去實現更迅速的社會經濟轉型。

儘管葉利欽標榜民主，其本人也是經由民主選舉當選總統的，但葉利欽政權的建立和維持主要依賴軍方的支持。一個簡單的事實是，軍隊在1991年幫助葉利欽取得了政權，在1993年又幫助他維持了政權。在1991年8月的政變中，蘇聯軍隊的指揮官拒絕執行進攻議會大廈、逮捕葉利欽的命令。當時給人印象最深的一幕，就是葉利欽站在坦克上，宣讀一份拒絕接受緊急委員會命令的文告。人們經常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當時他是站在坦克上。1993年10月，在葉利欽與議會最後攤牌時，軍隊執行葉利欽的命令，用大炮轟擊了議會大廈。

葉利欽手下的將軍對他忠心耿耿。相應地，他給他們的回報是，保持軍事統帥部的原有結構，對他們的腐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允許他們在1994年12月入侵車臣，當時的國防部長葛拉契夫 (Andrei Grachev) 許諾說，這將是對車臣這個叛逆共和國發起的一場「短期的、勝利的戰爭」。

儘管如此，俄羅斯軍隊在90年代還是吃了不少苦頭，其預算被削減了，不得不從東歐撤軍。不過，軍方還是堅拒改革，兩年服役期一直讓人深惡痛絕，就很能說明問題 (儘管葉利欽和普京總統多次許諾要建立一支職業化軍隊)。1999年秋，軍隊再次進攻車臣，這是決定普京當選總統的最重要因素。

蘇聯時期遺留下來的另外一個建制就是秘密警察 (蘇聯解體後重組為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簡稱FSB)。這一建制在新的民主市場經濟中贏得了一個合適的位置。在政治競選和董事會鬥爭中，秘密警察搜集情報的本事十分高超。與此同時，他們又擁有合法的 (以及不那麼合法的) 暴力手段。這樣，在保安服務這個繁榮的市場上，他們就成為黑幫的有力競爭者。漸漸地，像內政部和聯邦安全局這樣的國家安全部門就把「保護傘」這個職能接了過來，為許多私營企業提供收費保安服務。自從有十七年克格勃工作經歷的普京 (Vladimir Putin) 於1999年12月就任總統以來，人們就更清楚地看到，聯邦安全局是俄羅斯新政權的主要統治工具之一。

(6) 新一代統治精英

政治制度在消亡、調適，或者被重新建立起來，與此同時，政治和經濟精英階層也正在發生同樣的根本變化。政治精英的頂層因參與1991年政變而名譽掃地，黯然離開了政壇 (有些甚至被投入監獄)。在這個混亂的過渡期，新一代政治領導人上台掌權了。這批人比他們的前任年輕得多，往往缺乏政治經驗。萊恩 (David Lane) 和羅斯 (Cameron Ross) 指出，在1991年以後的俄羅斯上層官員中，約有三分之一在1991年以前的上層機構擔任過某種職務^⑥。這意味着，三分之二的要職都被新人佔據了，新的精英階層與蘇聯時期封閉、僵化的精英階層分道揚鑣了。

另一方面，1991年以後的大多數領導人無疑都是通過蘇共或蘇共控制的組織 (如共青團和科學院) 層層培養、訓練和挑選出來的。年輕一代的俄國統治精

蘇聯政權的兩大支柱——安全部門和軍隊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成為1991年以後的政治秩序的重要元素。葉利欽政權的建立和維持主要依賴軍方支持。在91年8月的政變中，軍隊指揮官拒絕執行逮捕葉利欽的命令。當時葉利欽站在坦克上宣讀拒絕接受緊急委員會命令的文告。93年10月，軍隊執行葉利欽的命令，炮擊議會大廈。

英意識到，新出現的政治經濟體系為他們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他們很快就學會了新的選舉遊戲規則（同時修改了一些規則，使新規則對自己有利）。正如彼得羅夫 (Nikolai Petrov) 指出的，「第一次 (1989) 和第二次 (1990) 選舉深刻地影響了蘇聯的權貴階層，不過並沒有導致它的消亡，而是導致了它的變化。」^⑭

(7) 裙帶資本主義 (Crony Capitalism)

在過去十年裏，俄羅斯出現了市場經濟，大部分價格均按供需關係確定，大約三分之二的經濟活動發生在私營企業內部。不過，主導俄羅斯經濟的是一小群企業領導人——所謂的「寡頭」，其中大多數人都是在1992-1995年的私有化運動中憑藉與葉利欽政府的政治關係而發家致富的。

在蘇聯時期，做企業家是犯罪的。然而，在短短十五年間，俄羅斯已產生了三十六位億萬富翁，人數在世界上排名第三^⑮。世界銀行的一項調查顯示，截止到2002年，二十三家最大的公司控制了俄羅斯三分之一的工業^⑯。按國際標準來看，尤其考慮到俄羅斯這樣一個大國，這已經是很高的集中水平了。不僅如此，這些公司絕大多數似乎都被一個人所控制。

1991年的蘇聯經濟結構完全不同於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經濟結構。它有一個按計劃經濟邏輯發展了七十五年的龐大工業基礎，目標是國家安全和社會改造。當這種經濟受供需關係支配時，又會出現甚麼情況呢？就核潛艇和太空站（在冷戰時期，正是這些項目使俄羅斯佔據了「相對的優勢」）而言，根本沒有一個「世界市場價」。1991年以後，國家和地區領導人試圖保護蘇聯時代的製造業和科研機構。但是，消費品產業被進口商品擠垮了，只有汽車、飛機等少數幾個製造業部門以保護關稅為後盾艱難地生存下來。

巨大的能源財富是俄羅斯的另外一個明顯優勢，但結果也是喜憂參半。它慫恿了精英人士尋租的短視行為，使他們不願意接受充分的經濟自由化。在1990-1995年間，石油產量從600萬噸下降到300萬噸。從1985-1999年，沒有鋪設哪怕一米長的新輸油管道。即使在1992年開始了市場改革，政府仍然控制着能源儲備，不讓外國投資者染指。國家擁有過半數股權的天然氣壟斷企業俄羅斯天然氣公司 (Gazprom) 用出口收入來補貼國內消費者，形成了一種以廉價能源為基礎的小型計劃經濟。電力價格只相當於歐洲價格的四分之一，於是，金屬生產廠家興旺發達，靠出口產品掙了數十億美元。

俄羅斯工業的私有化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 (1992-1994) 是將私有化證券分發給普通公民和工人，第二個階段 (1995-1997) 是以現金或投資抵押的形式拍賣國有資產。第一個階段使企業管理層的內部人 (insiders) 控制了俄羅斯的大多數公司，第二個階段使外部人 (outsiders) 獲得了某些最有利可圖的石油和金屬生產廠家的所有權。有些外部所有者通過起始階段的經營活動——進出口貿易、貨幣兌換、充當商品經紀人等等——賺取了最初的幾百萬美元，另一些外部所有者來自國家機關，他們利用各種關係將業務從國有貿易和銀行機構中分

政治精英的頂層因參與1991年政變而名譽掃地，黯然離開了政壇。在1991年以後的俄羅斯上層官員中，約有三分之一曾在上層機構擔任過某種職務。年輕一代的統治精英意識到，新出現的政治經濟體系為他們提供了難得的機會。此外，在過去十年裏，主導俄羅斯經濟的是所謂的「寡頭」，其中大多數人都是在1992-1995年的私有化運動中憑藉與葉利欽政府的政治關係而發家致富的。

拆出去。1995年開始的「貸款換股份」的拍賣活動完全被操縱了，以確保受到青睞的商人能夠勝出。這意味着，大多數寡頭實際上都是近水樓台先得月，他們是由擠進葉利欽內部圈子的密友「任命的」。

1997年，國內生產總值自1990年以來第一次有了提高，但宏觀經濟穩定卻很不可靠。政府大量舉債以彌補預算赤字。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世界石油價格下跌，減少了俄羅斯的往來帳戶順差，再加上預算赤字猛增，1998年8月出現了擠兌風潮，盧布大幅度貶值了75%。企業拖欠債務，幾乎所有的私營銀行都關門歇業了。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貨幣貶值是俄羅斯經濟在一段長時間內遇到的最好轉機，它遏制了食品和製成品進口，使國內廠商奪回了以前的市場。而且，普里馬可夫(Yevgennii Primakov)總理——前國外情報局局長——領導的新政府嚴肅地考慮對石油天然氣生產廠家實行增稅，同時對享受優惠的工業家和地區老闆實行減少補貼的政策。聯邦預算達到了平衡，截止到2003年，聯邦開支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例削減到15%，收入則增加到16.7%^⑦。

三 普京帶來了甚麼變化？

普京是葉利欽欽點的繼承人。葉利欽不能競選連任第三屆總統，他於1999年出人意料地辭職，提名普京總理為代總統。普京在2000年3月總統大選的第一輪中就明顯勝出，贏得了52%的選票。

剛開始時，人們以為普京只是葉利欽班子中的一個傀儡，會盡其所能堅持葉利欽的既定方針政策。普京避免對葉利欽提出批評，繼續留用了葉利欽手下的一些要員，例如卡西亞諾夫(Mikhail Kasyanov)總理和博羅金(Aleksandr Voloshin)參謀長。不過，人們很快就發現，普京的目標與葉利欽的大不相同。他的使命是要重建國家權力，讓俄羅斯變得強大起來。普京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不是一個思想理論家，他知道俄羅斯的普通百姓已經厭倦了革命性變化。普京力圖擴展從葉利欽那裏繼承來的體制，保留其中的一些要素，同時改變另一些。我們在前面列舉了葉利欽政策的七大特徵，普京保留了其中的大部分，僅僅在兩個方面做了根本改變，即分權和裙帶資本主義。黑幫逐漸被安全部門排擠出去，但還遠遠沒有被徹底根除。

事實證明，普京遠遠超出了觀察家的預期，是一位更強有力、更激進的領導人。不過，光從他的背景看不出他有這樣的潛力。普京在克格勃幹了十七年，乏善可陳。後來，他回到老家聖彼得堡，在市長手下工作，處理與外國投資者的關係。1996年，普京進入克里姆林宮，任職於產業署，短時間內就在總統府青雲直上，於1998年被任命為聯邦安全局局長。1999年8月，在車臣叛軍襲擊了附近的達吉斯坦之後，普京被任命為總理。在隨後的一個月內，俄羅斯的

普京是葉利欽欽點的繼承人，當初人們以為普京只是葉利欽班子中的一個傀儡，但很快就發現，普京的目標與葉利欽的大不相同。他的使命是要重建國家權力，讓俄羅斯強大起來。普京力圖擴展從葉利欽那裏繼承來的體制，僅僅在兩個方面做了根本改變，即分權和裙帶資本主義。事實證明，普京遠遠超出了觀察家的預期，是一位更強有力、更激進的領導人。

幾座城市遭到了嚴重的恐怖炸彈襲擊。普京的目標是派軍隊征服車臣共和國，將叛亂一勞永逸地鎮壓下去。到了2000年春天，俄羅斯軍隊已經奪回了車臣低地，但要把恐怖份子從山區、從民眾支持者中徹底根除，恐怕還有待時日。

從風格和個性來看，普京與葉利欽大相逕庭。葉利欽疾病纏身，經常醉酒，性格古怪，容易動感情。相反，普京年輕，身體健康，有個人魅力，有理性——儘管他有時也難免情緒激動。普京的政治風格屬於操縱型和計算型，而葉利欽則喜歡對峙。普京叫人團結，葉利欽叫人分裂。

普京身上有一些奇特的混合品質。他是一個毫無政治經驗的秘密警察，但他那平易、謙虛的作風很快贏得了普通百姓的好感。儘管普京是平民背景，但他卻與布什 (George W. Bush) 和施羅德 (Gerhard Schroeder) 之類互不相同的世界領導人保持着良好的個人關係。普京似乎明白現代世界是怎樣運轉的，也明白俄羅斯是怎樣運轉的。他希望俄羅斯能夠從「硬實力」(核武器) 轉向「軟實力」(經濟和文化影響)，從而保持其大國地位。與此同時，他站在傳統的、地緣政治的立場上看待俄羅斯的安全問題，強調與現已獨立的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發展密切的政治和經濟關係。

(1) 普京說了算

普京保留、甚至加強了超級總統制。他提高了總統府的工作效率，並將國家杜馬置於更嚴密的控制下。

普京在2000年5月就職後沒幾天就清除了兩個最有政治影響的電視業寡頭，這兩人掌握着在俄羅斯選舉中起了關鍵作用的兩家主要電視台。先是古辛斯基 (Vladimir Gusinsky) 被迫放棄了對NTV電視台的控制權。電視台被要求還清貸款，結果只能宣告破產，古辛斯基同時還面臨刑事起訴的威脅。同樣的策略也被用到了ORT電視台的所有者別列佐夫斯基 (Boris Berezovsky) 身上，他(按照他的自述)曾經推動了普京在葉利欽手下的崛起，並在整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兩人後來都到了國外。

正在進行中的車臣戰爭是一種示範性的武力使用，表明俄羅斯國家嚴肅地想要恢復權威(所謂的「權力垂直」結構)。普京採取了決定性的行動，欲將俄羅斯各地區置於更嚴密的中央控制之下。他建立了一種新的官僚結構，即總統代表，借此加強行政和財政紀律。總統代表主管七個新的聯邦區，俄羅斯八十九個地區均有一名聯邦督察員。俄羅斯聯邦委員會(議會上院)原來由地方行政長官和地方議會首腦組成，普京改變了上院的組成方式並削弱了它的影響力。從2001年開始，上院由每個地區的行政和立法部門提名的代表組成。

普京恢復了俄羅斯法律和行政的統一性，但他卻在一場更嚴肅的戰役中退卻了。這場戰役就是，清除腐敗的地方領導人，而代之以效忠普京的人。看來謹慎的普京寧願籠絡現任的地區領導人。

普京加強了超級總統制。他提高了總統府的工作效率，建立了一種新的官僚結構，即總統代表，借此加強行政和財政紀律。車臣戰爭表明普京欲將俄羅斯各地區置於更嚴密的中央控制之下。普京改變了上院的組成方式並削弱了它的影響力，將國家杜馬置於更嚴密的控制下。普京恢復了俄羅斯法律和行政的統一性，但他卻放棄清除腐敗的地方領導人，寧願籠絡他們。

(2) 權力的鞏固

俄羅斯在2003年發生了兩件戲劇性的大事，證明俄羅斯過渡到西方式「市場民主制」的希望已化為泡影。普京總統將俄羅斯頭號商人霍多爾科夫斯基 (Mikhail Khodorkovsky) 拉下了馬，並利用這個機會使親總統的統一俄羅斯黨在2003年12月舉行的國家杜馬選舉中大獲全勝。

首先是尤科斯 (Yukos) 事件。2003年6月，國家開始對俄羅斯最大石油公司尤科斯的領導人展開刑事調查。最初的主要指控是，尤科斯公司首席執行官霍多爾科夫斯基在1994年私有化交易中涉嫌欺詐。後來，指控範圍進一步擴大，涉及到洗黑錢和逃稅，逃稅金額達50億美元。霍多爾科夫斯基拒不認輸，不願意逃離國家。結果，他於2003年10月被拘捕並不得保釋，如果罪名成立，有可能被判處十年監禁。2004年6月，公司因積欠的稅款而受到進一步指控，實際上等於被逼破產了。在尤科斯事件中，葉利欽班子的最後幾位領導人被迫去職。2003年10月博羅金參謀長辭職，2004年2月卡西亞諾夫政府被解散。

霍多爾科夫斯基之所以被單獨挑出來作為攻擊對象，恰恰因為他是最成功、最野心勃勃的寡頭。當時，公司正與俄羅斯第五大石油公司西伯利亞石油公司 (Sibneft) 合併，並且還計劃隨後與一家主要的西方石油公司——很可能是艾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合併。霍多爾科夫斯基還計劃鋪設一條通往中國的新輸油管道，這將打破國營的管道建設運營公司 (Transneft) 在俄羅斯石油出口方面的壟斷地位。霍多爾科夫斯基從不隱瞞他的政治野心，經常慷慨解囊資助一些政黨，從自由派的亞博盧集團 (Yabloko) 到共產黨都接受過他的捐助。據專家推測，尤科斯公司原本有可能控制2003年12月選出的國家杜馬的三分之二議席。

普京決心掀起一場反腐運動清除這個政敵，這正好為親總統的統一俄羅斯黨在2003年12月的國家杜馬選舉中提供了一個深得人心的競選主題。議會選舉非常重要，因為它將為定於2004年3月舉行的總統選舉做好鋪墊。這次選舉打破了90年代政壇上自由派、共產黨和傳統主義者三足鼎立的局面，實際上將俄羅斯變成了一個一黨制國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議會選舉使克里姆林宮獲得了一個削弱俄羅斯邁向多元化水平的機會。

親總統的統一俄羅斯黨在選舉中大獲全勝，贏得了38%的民眾選票，最後獲得了議會450個席位中的302個。統一俄羅斯黨在政黨名單制選舉中獲得了120個席位，在單一議席選區中獲得了126個席位。議會選舉結束後，56位在單一議席角逐中獲勝的獨立人士加入了統一俄羅斯黨。這不僅是一個令人愜意的有效多數，而且超過了修改憲法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我們可以期待，國家杜馬在未來的日子裏會快速而平靜地批准克里姆林宮的任何立法提案。國家杜馬選舉結束後，普京在總統競選中沒有遇到任何有威脅的對手，在2004年3月順利在第一輪中就贏得了勝利。

兩個自由派政黨——亞博盧集團和右翼力量聯盟——沒有突破5%的關口，因而未能在政黨名單制選舉中獲得議席。兩黨合在一起，僅在單一議席競選中

俄羅斯在2003年發生了兩件戲劇性的大事，證明俄羅斯過渡到西方式「市場民主制」的希望已化為泡影。該年6月，國家開始對俄羅斯最大石油公司尤科斯的領導人展開刑事調查，葉利欽班子的最後幾位領導人亦被迫去職。尤科斯公司原本有可能控制該年12月選出的國家杜馬的三分之二議席。普京決心掀起一場反腐運動清除這個政敵。

獲得了7個席位，而在即將到期的議會中，它們原有47個席位。自由派在普京治下失去了方向感，他們在支持還是反對總統這個問題上意見分歧。自由派對克里姆林宮的反寡頭運動的批評也使他們丟掉了選票。

共產黨反對派也受到了嚴厲抨擊，他們眼睜睜地看到自己的支持率從1999年的22%下降了一半。與此同時，民族主義者開始重新得勢。日里諾夫斯基 (Vladimir Zhirinovsky) 領導的政黨贏得了12%的選票，祖國黨——克里姆林宮在選舉前三個月剛剛組建的一個新的民族主義政黨——贏得了9%的選票。日里諾夫斯基和祖國黨均效忠於普京。

統一俄羅斯黨之所以在選舉中獲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調動了國家的「行政資源」。該黨在國家電視網絡中有很高的曝光率，而普京在頭一年已關閉了俄羅斯最後一家獨立電視台——「電視六台」。統一俄羅斯黨勸說幾乎所有的地區領導人支持其競選活動，有三十個州長支持該黨的政黨名單。作為回報，克里姆林宮緩和了對那些不聽話的地區鐵腕人物的批評。中央選舉委員會就像奧威爾 (George Orwell) 描繪的「選舉部」那樣行事，對媒體報導做了許多荒謬的限制，經常由於某些微不足道的原因就將麻煩的候選人撤掉。

四 未來的走勢

俄羅斯將會走向何方，現在尚難逆料。有人認為，普京想廢除寡頭資本主義，重新回到國家控制的經濟體制。不過，我們還不清楚他究竟會朝着國家控制的方向走多遠。普京對自己打擊的寡頭是精心挑選的，那些效忠於克里姆林宮、避免與反對派的政治活動發生關係的商界領導人全都平安無事。普京並沒有廢除寡頭資本主義體制，相反，這種體制得到了重新調整，從競爭群體的橫向多元主義 (以克里姆林宮為仲裁者) 變成了垂直的等級結構 (以普京為首領) ⑩。

擁有控制權的國家與私人寡頭相互並存，這種混合體制能否維持下去，現在還很難說。或許這種體制在政治上是可行的，但它在經濟上可行嗎？政治風險很可能有礙於持續經濟增長所需的投資和競爭環境。隨着新油田的開發和新輸油管道的鋪設，隨着電信營業執照進入拍賣市場，寡頭們將展開一場激烈的競爭，他們知道競爭結果很可能取決於政治上的裙帶關係。在這樣的環境中，由於政治風險的提高，寡頭們也許不那麼願意將利潤用於再投資，擴大自己的業務。在90年代的俄羅斯，資本外逃的規模相當可觀，每年達到200億美元。雖然2003年有所減少，但2004年似乎又回升了。

這些政治上的不確定因素對外國投資者而言是一道特殊的屏障，因為他們在克里姆林宮沒有甚麼朋友，卻有許多對手。在俄羅斯，外國直接投資每年不超過50億美元，僅為中國的十分之一。儘管普京嘴上說要鼓勵外國投資者，但在涉及石油天然氣等戰略性工業項目時，從來不允許外國投資者成為大股東。

在2003年12月的國家杜馬選舉中，親總統的統一俄羅斯黨大獲全勝，超過了修改憲法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打破了90年代政壇上自由派、共產黨和傳統主義者三足鼎立的局面。自由派在普京治下失去了方向感，他們在支持還是反對總統這個問題上意見分歧。共產黨反對派也受到了嚴厲抨擊，支持率從1999年的22%下降了一半。民族主義者開始重新得勢。

開發薩哈林油田和天然氣田的合資企業是一個主要的例外。由於近海鑽井有很大的技術難度，俄羅斯人沒有別的辦法，只能引進國外技術。

我們有沒有理由樂觀呢？從1999年開始，俄羅斯經濟已連續五年以每年7%的速度遞增。莫斯科的城市面貌大為改觀，一些財富慢慢流入各州，其表現形式是通貨膨脹率低，工資和養老金能夠按時支付。應當承認，這種恢復是由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氣出口——的激增帶動起來的。俄羅斯原油從每桶12美元的低價提高到2004年年中的36美元。不過，根據前面引述過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在俄羅斯的經濟增長中，估計只有三分之一源於石油價格的提高。近年來，俄羅斯工業削減了冗員，提高了生產率，並開始投資。

在政治戰線上，經過2003年的選舉，俄羅斯出現了一種經過重建的威權主義政治體制。俄羅斯人（以及局外人）所能期望的最佳效果就是，這是一種開明的威權主義。不過，有幾個理由讓人覺得，這種威權主義可能不會那麼溫和。

首先，我們應該注意這樣一個事實：普京在建立新體制時高度依賴於來自安全部門的幹部。「西羅維基」(siloviki，即從聯邦安全局、警察局和軍隊調來的「實力人物」)在俄羅斯政府機構中所佔的比例至少達到了四分之一^⑨。不管普京推動俄羅斯現代化的議程是怎樣的，這批人對民主和市場經濟制度只有膚泛的理解和信念。相反，他們有自己的議程：無情地發動車臣戰爭，將俄國人的權力延伸到前加盟共和國，也許還要挑戰美國在這個地區的霸權。

第二個問題是，2008年會出現甚麼情況？普京在2004年3月再次當選總統，但是，憲法不允許一個人連任三屆總統，普京也多次表示他無意修改憲法。然而，普京的個性對他本人所建立的政治體制的穩定性來說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在普京政府中，在統一俄羅斯黨的領導層，沒有哪個人能夠平衡政府中的經濟管理者與安全官員的衝突觀點，同時又始終獲得民眾的支持。因此，絕大多數俄羅斯人——不管是左翼還是右翼——都認為，修改憲法以延長普京的任期是不可避免的，否則就只能回到90年代初那種爭鬥和不穩定的狀態。

儘管普京的民主資質十分脆弱，但他對市場經濟的信念是堅定的。他實行了一系列法律和稅制改革，這些改革為競爭的市場經濟奠定了基礎。鑑於普京有一個聽話的國家杜馬作後盾，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這些改革——尤其是龐大的、極其混亂的公用事業部門的改革——還將繼續下去。

最後，俄羅斯出現了某些市民社會的跡象。非政府組織、成功的商人和新建的教育機構正在引起人們的關注。在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這些進展都發生在國家的政治制度之外。這不失為明智之舉，尤科斯事件已經告訴我們，當這些社會勢力試圖進入政治領域時，便會出現甚麼樣的情況。我們有理由期待，在未來的日子裏，國家和市民社會將展開更協調、更有成效的互動。要不然，就只能再度採取蘇聯式的手段扼殺市民社會，那樣就太可怕了，真是連想都不敢想。

俄羅斯將會走向何方，現在尚難逆料。普京並沒有廢除寡頭資本主義體制，相反，這種體制得到了重新調整，從競爭群體的橫向多元主義變成了以普京為首垂直的等級結構。有沒有理由樂觀呢？從1999年開始，俄羅斯經濟已連續五年以每年7%的速度遞增。儘管普京的民主資質十分脆弱，但他對市場經濟的信念是堅定的。鑑於普京有一個聽話的國家杜馬作後盾，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改革還將繼續下去。

註釋

- ① Vladimir Kontorovich and Michael Ellman, ed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oviet Economic System: An Insider's History*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8).
- ② Peter Reddaway and Dmitri Glinski, *Tragedy of Russia's Reforms: Market Bolshevism Against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US Institute of Peace, 2001). 對葉利欽的比較積極的看法，參見Leon Aron, *Yeltsin: A Revolutionary Lif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對葉利欽的比較中性的分析，參見Lilia Shevtsova, *Yeltsin's Russia: Myths and Reality*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1999)。
- ③ Joel Hellman, "Winners Take All: the Politics of Partial Reform i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s", *World Politics* 50, no. 2 (January 1998): 203-35.
- ④ Eugene Huskey, *Presidential Power in Russia* (Armonk, NY: M. E. Sharp, 1999).
- ⑤ Thomas F. Remington, *The Russian Parliament: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in a Transitional Regime, 1989-1999*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⑥ Richard Rose and Neil Munro, *Elections without Order: Russia's Challenge to Vladimir Put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Timothy Colton, *Transitional Citizens: Voters and What Influences Them in the New Rus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⑦ Michael McFaul, *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Political Change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 ⑧ Fareed Zakaria, *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 (New York: Norton, 2003).
- ⑨ Joan Barth Urban and Valerii D. Solovei, *Russia's Communists at the Crossroad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7).
- ⑩⑬ Nikolai Petrov, "Elections in Russia 1989-2001", in *Restructuring Post-Communist Russia*, ed. Stefani Hoffman et a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⑪⑰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 Survey. Russian Federation 2004* (June 2004). www.oecd.org.
- ⑫ Federico Varese, *The Russian Mafia: Private Protection in a New Market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⑬ 他們從1991年到1995年的政治和經濟精英中挑選了800名官員，對其傳記材料進行考察，同時還採訪了116名官員。參見David Lane and Cameron Ross, *The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Ruling Elites from Gorbachev to Yeltsi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 ⑭ "Rising Tide", *Forbes*, 15 March 2004. 《福布斯》在2月份列出了二十五位億萬富翁，在5月份又將這個數字增加到三十六位，反映了對其股票持有的新的估價。這一調查的作者、《福布斯》俄文版主編克列布尼科夫 (Paul Klebnikov) 於2004年7月9日在莫斯科遭槍殺。
- ⑮ World Bank, *From Transition to Development, 2004*, section CV. www.worldbank.org.ru .
- ⑯ Aleksei Zudin, "Neokorporatizm v Rossii?", *Pro et Contra* 6, no. 4 (2001).
- ⑰ Olga Kyshtanovskaya and Stephen White, "Putin's militacracy", *Post Soviet Affairs* 19, no. 4 (October 2003): 289-307.

拉特蘭 (Peter Rutland) 美國康涅狄格州衛斯理大學 (Wesleyan University) 政治學教授，日本上智大學訪問教授，並在聖彼得堡歐洲大學任教。主要著述有 *The Myth of the Plan: Lessons of Soviet Planning Experience* (1985)、*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Stagn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1993)，並編有 *Business and State in Contemporary Russia* (2001)。